

试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孙少艾

摘要 郑观应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和早期维新派代表人。在他的理论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经济问题的论述是其重要内容。首先,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洋务经营中官督商办的弊端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护商与听商自办的思想,将“商”视为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次,主张大力振兴工商业,以对外贸易为突破口,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为稍后戊戌维新派提出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郑观应 《盛世危言》 经济思想 护商 重农抑商 商战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近代著名的爱国者,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抛弃仕途,转而经商,在外国洋行做买办。1880年后,又以商股代表的身份参加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企业的帮办、总办等重要职务。在长期的实业经营活动中,他深入调查研究,崇尚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积数十年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其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郑观应的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此书初刊于1893年,共五卷五十七篇,后经1895年和1900年两次增订。这本书可说是郑观应社会改革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涉及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对经济方面的论述,质高量多,高人一筹,尤其是他的“商战”思想颇具特色,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其经济思想作一粗浅的论述。

对“重农抑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批判,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朝统治者的基本国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这种思想是根植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是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阻碍作用。因此,直到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虽有所增长,但仍极其微弱,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然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时期,为寻找更为广阔的殖民市场,正迫不及待地想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他们力图把中国变成其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供应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陷入沉重危机之中,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了加速瓦解的进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加剧并逐步尖锐起来。面对这“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

来未有之强敌”,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危亡,清政府中一批有作为的开明官僚打起了“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与此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也纵论于下,积极鼓吹洋务,并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之中。他们既是洋务思潮的鼓吹者,也是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言人。欧风美雨的东袭,西方学说的传入,促使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念起了变化,并日益呈现出与洋务派分离的趋势,形成带有鲜明时代内容和阶级实质的新思想。随着洋务运动兴起和发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产生了。此时,国内资本的构成中,已明显地形成了两部分:一是封建国家资本的投资,另一是由地主、官僚、商人积累起来的私人资本的投资。洋务派代表国家资本的利益,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言人则成为私人资本的代表。

但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自从诞生伊始,就举步维艰,发展十分缓慢。资本主义的成长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及各种特权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廉价抢购原料,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向清政府进行奴役性贷款,这些都直接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国内封建主义的阻碍。清政府仍在沿袭农本商末,对工商业进行限制的政策,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厘金关卡,使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时有破产之虞;洋务派具有倾向资本主义的一面,要求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也对封建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满,要求发展新式工商业,但其本身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关心的是封建政权的理财、开源、筹饷,因而压制洋务企业内外私人资本代表——“商民”的利益,对新式工业进行封建性的垄断和控制;更为严重的是根植于自然经济内部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以本末、义利、奢侈等封建经济范畴为补充的传统思想仍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多数官僚士大夫仍固守传统的思想,向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作为私人资本代言人的早期维新派郑观应继承和发展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吸收和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对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展开了批判,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探讨中西贫富强弱的本源。

郑观应指出:“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①中国积贫积弱的根子在于传统的“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当今之世唯有效法西方,变抑商为重商,才能达到富强之境,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因此必须从根本上破除“重农抑商”等观念,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商”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郑观应还以历史发展眼光展开了对传统封建经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②“稀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本。”^③并强调:“古人所谓商,……非今所谓商也。”^④“居今世而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⑤反映出他的重商思想和鸦片战争时期“反抑商”思想的不同。他所重的商,已经不是以前封建性的工商业了,而是赋有全新内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了。郑观应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他说:“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新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⑦“富强由来在商务,商出农工须保护。”^⑧而且振兴商务可带动各行各业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所谓“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岂可视为末务哉!”^⑨显然,他把“商”视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心环节,认为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本源。

郑观应参与洋务经营多年,对洋务运动的弊端有深切的体验和认识。他尖锐指出:官督商办企业中“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唯利是图者,必借端而一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⑩“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⑪因此,他特别强调商民的利益。在《易言》一书中曾多次提到“富我商民”,“卫我商民”。在《盛世危言》中更集中地提出了护商与听商自办的思想。他主张“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股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⑫同时,针对中国轻视商人的社会积习,郑观应极力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主张重新排定“士农工商”的“座次”,明确提出“变降古之习,视商如士”^⑬,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

总之,郑观应是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考虑和观察社会经济问题,他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官督商办弊端的批评,虽然不够深刻,没切中要害,但的确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大造了舆论,并反映了十九世

纪下半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一次大革命。而他本人正是在对传统经济观的批判中确立了其重商主义思想。

二

大力振兴工商,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维护中国民族经济利益,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是郑观应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最突出的表现。

商务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开关互市以来,中国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贸易逆差,白银外流情况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在1867—1894年的27年中,棉纱进口增长了12倍,煤油、火柴、五金器材、糖类制品等进口也有较大增长。在不计算鸦片的正常贸易中,中国也由出超转为入超,从1877—1894年平均每年入超达18391000海关两。这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早在六十年代,洋务官僚曾国藩曾指出:“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露出一点对“商战”欣赏态度。随后,刘铭传、张之洞呼吁“讲求商政”,强调“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盛宣怀有“开关互市,以商战为先”之语。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王韬也强调“以商为战”。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早期维新派都发出了“以商敌商”、“收回利权”的呼声,反映出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局势的新变化。面对外国经济侵略的不断加剧,利权丧失严重,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衰败的严峻现实,郑观应继承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精髓,在王韬、薛福成等先进思想以及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商战”学说。

“商战”论的基本观点,即“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认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借战争或和平的手段进行经济掠夺,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这是不如兴师动武那样易被察觉的“商战”。这里郑观应吸收了王韬关于“彼所患者,不在我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用“兵战”对付军事侵略,“商战”对付经济侵略的观点。通过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兵战”“商战”和“传教”三种方式的比较,认为经济侵略最危险。郑观应在《商战》中对列强的侵略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腊,则举之如发蒙耳。”^⑨在列强经济侵略下,中国将耗尽民脂民膏,变成弱不禁风的病夫,即使船坚炮利,又怎能对敌作战呢?强兵固然重要,但强兵必须与发展经济联系起来。只有经济发展了,以富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兵才能真正强大。因为工商业发展了,不仅能致富,而且能保证军队有自造的不断更新的武器装备,更能制造出价廉物美的商品与外国相竞争。他认为要真正富强,必须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强。他说:“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⑩因此,制伏之法,是以商战对之,“习兵战不如习商战”。郑观应的原则是“以毒攻毒”。不难看出,同一般人着眼于政治和军事不同,郑观应着重揭露了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性,从而强调了商战的必要。

为了进一步论证此观点,郑观应引用了日本如何取得商战胜利的实例,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学习西方,奋发图强。日本政府注意到进口货对本国经济利害兼有的二面性,因此对进口洋货加以研究,招商集股,建厂仿制,并给予厂商优惠政策和自主经营权。于是自行生产的商品不但满足了国内市场,而且还可供出口,售于中国。日本人吸取西方善于经商的经验,择善而从,那么,我国何不顺应时势,效法日本?况且“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⑪商战如能制胜,何愁兵战不胜。

商战同重商紧密结合,郑观应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直接联系起来,把它放在民族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充分体现其经济思想的资产阶级属性。

郑观应虽强调商战的重要,但也并未忽略兵战的力量,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是交相为用、相辅相成的,其根本原则是“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因此,“当今之时,谋人家国事,必须以通商练兵二者为尤,亟通商以为强。”^⑫要兵战与商战并举,以商战为主。兵战是末,商战是本;有形之战治其标,无形之战固其本,治国者“宜标本兼治”。学日本振工商以求富,行无形之战;学泰西讲武备以图强,行有形之战。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如何才能振兴商务,与资本主义列强进行“商战”呢?郑观应提出了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全面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体系。在商战的总目标下,从生产过程到流通过程,郑观应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

以对外贸易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点。商战是彼以商来,我亦以商往。面对中外通商中利源外流的状况,郑观应大声呼吁“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⑧他认为变外贸逆差为顺差是当务之急,必须以对外贸易为突破口,努力扭转外贸逆差。因为,世界进入资本时代后,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贸逆顺反映的是国力的强弱。为此,郑观应拟有许多的设想和方案,总的一条即“必使中国所需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中国者,皆可自运。”^⑨他条分缕析地将敌鸦片、敌洋布、敌用物、敌食物、敌零星杂货、敌五金矿物、敌日用货物、敌珍奇玩物、敌钱币洋银等列为“十战”,而要者是振兴丝茶两业。“十战”不仅意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减少贸易赤字,而且提出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观点。

既然要与列强开展贸易战,在市场上和外国列强进行竞争。那么,决定竞争胜败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制造出成本低廉的工艺品,即“尤必视工艺之巧拙”。郑观应吸取了薛福成的“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⑩,振兴商务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思想,指出工业和商业二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即“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如有商无工,则是“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他充分认识到机器生产“功程较速,工价必半”、“一夫可抵百夫之力”的强大威力,因而对中国不讲求先进机械技术,致使“制造不如外洋之精,价值不如外洋之廉”,以致不敌洋产的落后状况颇为不满。郑观应强调“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他对机器制造、技艺、格致相当重视,并提出要用购买和自造的办法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外,还必须减少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费用。于是郑观应又提出了以下的意见。其一,完全按照“商贾之道”办企业。当时洋务企业,一般都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由于督办的官吏的个人利益与企业本身在利益上是脱节的,因此他们对企业经营是否成功无动于衷,对保护商人投入企业资本亦无兴趣,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以权谋私,千方百计损企业以自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遵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必然造成企业的亏损,故而官督商办渐渐成为发展近代企业一大障碍。郑观应对此极为不满,他批评道:“全以官派行之。位高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商股〕位卑而权轻,相率听命,不敢多言”^⑪,强烈要求所有企业“不由官办,专由商办”,“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于官场体统”。显然,所谓“商贾之道”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发展轮船、铁路、电报以降低流通费用。因为“轮船往还费省快捷”,火车作用在于“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商贾便于贩运。”^⑫电报作用在于“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继,而有者常赢”^⑬其三,铸造简便的通货和创办银行,以促使商品交易和加速资本周转。由于洋商在同中国交易时,以本国成色不足的银元买我等价之货,并且洋人以洋钱兑换白银时,抬高洋价,换我标准纹银,郑观应对中外商战中金融所起的作用颇为关注。主张铸造一定分量的主币、辅币,既便于交换,又可以堵塞外币输入。银行则可“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既可代筹企业资金,又可在银根短绌的情况下借本行汇票流通,以解决商品生产和流通中资本短缺的问题。

此外,商战的胜负和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要振兴工商业,行政管理机构及其人员至关重要。为此,郑观应提出:在中央设立商部,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任商务大臣,管辖商务,协调士农工商的关系;在地方建立商务局等机构,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商务局的职能应是考核工商业的成绩,举办优秀商品展览会,勉励精益求精,嘉奖高超的技能。不仅如此,郑观应还建议政府采取必要的辅助措施:立商法;创办工艺学堂,聘请欧洲的能工巧匠为师;由政府资助发明创造,新产品拥有专利权;修订税约,实行关税自主;废除厘金,“酌加落地税,概免厘金,庶不致华洋两歧,洋商受益而华商受困”^⑭,还有“减内地出口货税,以畅其源,加外来入口货税,以遏其流”。商战须要政府和商民齐心协力方能获胜。

